

唐代詩人审美心理

□ 卢燕平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序 言

这本册子是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之余写出的，愿它能为读者的精神生活和唐诗研究领域献上一朵小花。

全书包括的十二篇文稿，皆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去体察、探讨唐代的诗歌。前四篇研究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诗歌表现出的审美心理的共性，将四篇贯串，唐诗中审美心理的群体发展线索就勾勒出来了。其余八篇，选择富有创作特色的一二流作家，剖析其诗审美心理的个性，乃与共性相得而彰。全书虽未囊括唐代诗人审美心理的全部，庶几揭其大端。我之所以未把教科书式的书题相应写成系统化的书稿，一是学力、精力不及，主要的还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忙碌的读者对书文短而新的口味。

读者与作者的以心会心是作品被接受的标志，这是由文学表现心理的深刻层面所决定的，诗歌更是如此。唐诗作为我们这个诗歌国度的精神财富，亦须得到心解了达的“利用”。凭着诗的心声，今人大可逆知古人之心。谨以此愿我们古国的诗美青春常在！

本书扉页书名，承蒙唐诗研究的老前辈刘开扬先生在百忙中签题，谨在此致谢。

卢燕平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于金城

目 录

情感对大一统伦理的指向

——初唐诗人审美心理分析…………… (1)

盛唐诗人审美心理论…………… (23)

从言志求善到言情求美的过渡

——中唐诗人审美心理及其地位…………… (45)

论晚唐诗的意境回归…………… (74)

李白天真论…………… (89)

略论李白诗以意驱象的特点及其文化心理成因…………… (106)

杜诗情志散论…………… (116)

论杜甫诗意象的涵括特色…………… (123)

论王维诗“静”的手法及其心态…………… (131)

试论刘禹锡诗的精神美…………… (142)

试论李贺诗以殊态心理为基础的殊态意象…………… (155)

论李商隐诗的心境化…………… (179)

情感对大一统伦理的指向

——初唐诗人审美心理分析

一、大一统的吸引力

龙行踏绛气，天半语相闻。混沌疑初判，洪荒若始分。

——阎朝隐《奉和登骊山应制》

这首登山诗，形象地写出了初唐诗人对大一统王朝初建的直觉。惊喜、自豪和非凡的气度表露在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大一统王朝对士人的巨大向心力。

文化创造是个人创造的集合体。有趣的是初唐士子的个人创造，包括作为创造先声的意向、情感、幻想、反思等，都趋向大唐的伦理政治，仿佛诗人被一种无形的向心力所引。这突出地表现在游宦诗中。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抒情高潮是继“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来的，化自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之句，正是以远大的自期，有对新建王朝的责任感和功业创造动机。无独有偶：

金门去蜀道，玉垒望长安。岂言千里远，方寻九折难。西上君飞盖，东归我挂冠。猿声出峡断，月彩落江寒。从今与君别，花月几新残。

——崔信明《送金竟陵入蜀》

金碧禹山远，关梁蜀道难。相逢属晚岁，相送
动征鞍。地咽绵川冷，云凝剑阁寒。倘遇忠孝所，
为道忆长安。

——卢照邻《大剑送别刘右史》

友人送别以宦达为期，故达观豪迈而不落以往惆怅的俗套。别诗里这样的情怀大量略同，只能说明士人们对大唐伦理政治的向往。这和晋代诗人对黑暗政治的诅咒迥然不同，与晚唐诗人那种“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韩偓《即目二首》其一）“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郑谷《自遣》）的厌倦官场也大相径庭。初唐前五十年，战乱频仍，以武功创业的唐太宗李世民就说：“吾才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重以薛举之骁雄、宋金刚之鸷猛，竄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洛阳，当此之时，足为勍敌，皆为我所擒”（《旧唐书·虞世南传》）。一语括尽平定内忧外患的艰辛，亦可从中想见这种时代氛围对诗人的影响。故初唐诗人对大一统的向往，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做官门径上，更拓宽思路至军功。初唐的边塞、从军诗中豪壮的怀抱，不亚于盛唐。魏征的《述怀》，颇有“创业艰难百战多”的悲壮和开朝立代的自信。骆宾王的《从军行》、《侠客远从军》，卢照邻的《刘生》，刘希夷的《从军行》，陈子昂的《东征答朝臣相送》、《送魏大从军》，都有相似风概。最使人击节叹赏的要算祖咏的《望蓟门》：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
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

云山拥薊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这种威慑四方、一统天下的豪气，这种虽处“膺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的艰辛境域，仍欲报君封侯的执着坚韧，恰恰反射出大一统的吸引力，是对皓首穷经的另辟蹊径。绝少唐代中晚期边塞诗中时有的厌倦觚忤和钻进自我内心后的“轻烟般的烦恼”。

深渗入初唐诗人心理中的这种大一统的吸引力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承传前代的多种文化心理成因。首先，它与唐初中下层士人在统治者的优容下开始一定程度地实现自身价值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士阶层总是皇权的工具，他们的地位及其价值的实现，都与皇权的驾驭息息相关，而具体表现在参政做官上。西汉后期，由尊儒和家学承传等因素造成士族豪强的突起，尽管爆发了党锢之祸，还是不能挽回皇权失控的局面。相反，东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相残和农民起义的打击中灭亡。继起的曹魏朝廷鉴于前朝教训，对士族豪强采取优渥政策。魏文帝曹丕干脆制订九品官人法，把选官权拱手让给世族，保障他们世袭的经济、政治地位。魏晋乃至刘宋，士族专权的状况基本延续下来，如宋文帝刘义隆任用高门士族官僚王弘、王昙首、殷景仁等人，以抑制宰辅之权。皇帝优渥士族豪强，固然有拉拢利用其文化势力，提高皇族的文化地位等因素，却在客观上造成无法收拾的士族豪强势力膨胀的局面。

这种失控局面形成世族、寒门等各阶层利益的尖锐冲突，导致当时官场险恶异常和寒门士人的离心反叛。“竹林七贤”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在士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阮籍的佯狂、

刘伶的纵酒、嵇康的被杀，以不同结局引起士人愤世嫉俗的共鸣。这种氛围和豪强的压抑使统治者懂得了不能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将产生怎样的危险。于是司马氏政权待七贤中的山涛、向秀等人以高位，宋孝武帝起用鲍照等寒门为近臣。南朝帝王多奖掖隐逸，招隐士以作王制的股肱。隋唐以来，皇权更是自觉地开放仕途，吸引和控制寒士阶层。特别是废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将世族手中的选官权收归朝廷。“五服之内，政决王命，一命拜免，必归吏部”，（《通典·选举五》）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摭言》卷一引唐太宗语）。这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时代有着巨大的转折意义，它意味着士阶层只能归附王命而不能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也意味着隋特别是唐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成熟。

大一统初始，官本位利益的平衡与初唐奉行的休养生息、裕民给田政策的并行，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和走向高峰的重要环节。它的成功，使诗人对仕途和参政立功趋之若鹜。它对士人的吸引力不但表现在如前所举的诗例中，更具体表现在当时诗人的生活、思想方式中：

一是寒门士人的兴起和奋进。初唐成就较大的十多位诗人王绩、虞世南、李百药、上官仪、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等人，或家道中衰，人微言轻；或出身寒微，起于乡里。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文章四杰”更是“陟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王勃《涧底寒松赋》），以典型的寒门庶族成为当时中下层士人的代表。这些在初唐诗坛中举足轻重者不靠门第荫庇，全靠自己的文才韬略登上文化舞台，跻身文学史。而魏晋以来自恃华夏正统的崔、卢、李、郑等山东贵族和王、谢等江南贵族，因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新

的统治者为提高自己地位而对他们的抑扼，在隋及初唐已开始衰落了。唐太宗在审定《士族志》时所言透出个中消息：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表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楸，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旧唐书·高士廉传》

太宗令修《士族志》不论数世以前门第高下，只取今日文治武功所得官爵。唐统治者出身于西魏宇文泰的军人集团，李渊之祖李虎是宇文泰的八柱国之一，社会地位比起中原素享盛名的山东贵族低一格，所以唐太宗的这种逆反心理和强力抑扼是自然的。但这种主张及其修定《氏族志》、兴进士科举等相应措施，却使寒门庶族得以进身。新兴的中小地主阶层由此步入仕途，显示了比旧士族强大得多的集团性和生命力。诗在他们手里也一改贵族诗那种病态贫血的面貌，变得容光焕发起来，正是这种奋进心态的表现。

二是仕隐已无利益冲突。据刘肃《大唐新语·隐逸》，隋文帝以来皆优渥隐者，这有沿袭齐梁政策、扩充统治力量的需要。当时还未出现中唐以后封建专制升级、士人日渐离心的状况，因而诗人出处自若，仕、隐达到高度的平衡。王勃说：“引簪裾之胜侣，狎丘壑之神交”（《夏日宴张二林亭序》）。杨炯说：“群贤以公私有暇，休沐多贤。忽乎将行，指林壑而非远；莞尔而笑，览烟霞而在隅”（《杨炯集》卷三）。宋之问说：“入朝荣剑履，退食乐琴书。东隐东岩室，天回北斗车”（《奉和幸韦嗣立山庄》）。真是山中辇下，心合神通。士人兼通仕隐，“出处之情一致，筌蹄之义两忘”（王勃

《夏日宴张二林亭序》）。但无论心在魏阙、情游江海也好，身在江海、心向魏阙也好，隐只是仕的点缀和手段，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魏阙”，这个向心力牢笼士人心态，当时是无法高蹈无视的。后来司马承祯的“终南捷径”一语破的，遂把这种一度在士人间“默传心印”的入仕之道明朗化。为此鲁迅把唐诗分为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他精辟地指出，当时隐士和官僚最接近，无论帮忙还是帮闲，无非帮而已。

三是诗人多参政，以政治家自居。魏征曾连上四疏，以陈得失。悟其要，其一、二劝太宗政存宽俭，其三讲措刑，其四劝施德礼诚信，而要以区别君子小人。《旧唐书·魏征传》后评曰“可谓万代王者法”。太宗明察纳谏，至谓魏征死后痛失一面鉴镜。《旧唐书·虞世南传》载，虞世南死后太宗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陈之”。可见虞世南同魏征一样因匡辅时政受到太宗礼遇。太宗时文人诗藻丽沿旧制，多出于其自视参政者、无暇业诗的缘故。“四友”中的苏味道、李峤，曾分别于武则天延载初和圣历初官至宰相，崔融在圣历中官做到凤阁舍人。杜审言被武则天面擢著作佐郎。张柬之起兵诛杀武氏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后，放逐了“四友”等一批亲近张氏兄弟的文人，但因武氏新贵未灭，中宗时与之勾结的韦氏新贵又起，被贬逐的文人旋又回朝，“四友”基本是以善终的。当时统治有腐朽素乱的一面，《旧唐书·崔融传》后评苏、李“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但武氏政权承贞观之治，启开元之盛，毕竟有治理过渡之功。“四友”等一批文人当时首先是以佐治之臣而非诗人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的。《唐语林》卷五“补遗”云

上官仪因谏立武后而死，可见象上官仪这样诗风绮错婉媚的文人，当时在政治上也并非无动于衷的。至于“四杰”，虽官小寿短，不以政治施为而以诗闻名，但从其诗文所抒心迹看，他们“涉志远而心屈”，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陈子昂对武则天依附而不阿附，旨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的《府君有周文林郎陈公墓志文》载其父劝勉他的话：圣贤相逢，天下大治，否则大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武则天已处理百司奏事了，到他进士及第的嗣圣元年，高宗已死，武氏遂临朝称制，陈氏要遵从父旨做辅弼，就只有拥戴武则天了，他以文才见赏、被擢为麟台正字后，遂劝武氏兴明堂、太学，以正皇帝的名分。但他以后针对武氏弊政多次上疏，反对滥刑，主张措刑；反对亲佞，主张任贤；反对黷武，主张息兵；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节用爱民。他因犯颜直谏，不得善终。由上可见，和“人皆有一癖，我癖在章句”（白居易《山中独吟》），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那种专意立言的中晚唐许多诗人的心态迥异，初唐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创始人，他们的主要精力和自期是在参政做官上的。这种好尚对诗风的转变乃至唐文化的面貌的形成，都有重大的意义。

以上三点，无论寒门的兴起和诗人的参政、仕隐都表现了初唐诗主体的独特风貌，它们发自大一统的强大吸引力，又与这种特定环境中的精神产品息息相关。

二、情感的伦理化

唐初政治上的一统局面，要求审美趣味和诗风也随着改

变，为大一统的伦理政治服务。这种政治对文化的影响，早在隋代就已开始。王通继李谔之后，在《中说》中提出诗明纲常的主张。《中说·天地》：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遇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顷麓，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这种“天子所以风天下”、“蕃臣所以移其俗”（《中说·事君》）的主张，实质是先秦孔子诗教说的裔续。又据《唐语林》卷三《识鉴》：

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文辞，声振京邑。师旦考其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问无昌龄等名，师旦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

此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扭转浮靡诗风、讽谏教化、经世致用的诗歌创作趋向和要求。这与六朝求真爱美、表现个性的美学风尚相比，简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由于东汉以后统治者对文人的失控、文人的日渐离心，促使儒学衰微，日益显露出其用伦理道德禁锢人性的一面。玄学和老庄之学空前兴起，与主体意识、审美意识的觉醒恒

相伴随。如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所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象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魏晋南北朝诗人崇尚真而逸的审美人格和诗品。如《世说新语·品藻》推崇的人格是“远有思致”、“高爽迈出”、“清蔚简令”等。又如陆机、刘勰都强调审美时的排除伦理、功利杂念，心融于物，自由观照客体，所谓“收视反听”、“澄心凝思”（陆机《文赋》），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藻雪精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这皆源于《庄子·天道》的“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表现了摆脱伦理束缚，“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的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六朝的审美自律论达到高峰，日益代替了以礼节情的道德自律论。如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上，时人主张率性真情，独抒性灵。如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挚虞的“诗以情为本”（《文章流别论》），刘勰以为“立文之本源”应以“情”为“经”（《文心雕龙·情采》），姚察的“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抒怀抱”（《梁书·文学传》）。又如在审美趣味上，主张“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讲求言外之意，用意象说话，不取类比寄托的诗教之法。在诗文风格上，由曹丕始，讲求一个“气”字：“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古人以为元气充塞宇宙，延及包括人的万物。故这些地方的“气”，承生命之元气的本义，本质上是追求作品中的个性气质。由此可见时人主体意识与审

美意识的相得益彰。

我国古老的自然经济只能产生出人伦文化，即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而非求知关系。儒、墨、道、佛，虽异其流，却与此人伦文化同源，都是教人们怎样做人而非怎样求知。故随着时代、政治的变迁，某一家的学说及其派生的美学风气为士人所崇尚，便是自然中事了。初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稳固过程中，士人（尤其是富有竞争力和进取心的中下层士人）的利益、情感，随着统治的圆熟，与社会渐趋一致。诗人的情感由六朝的离心转为向心，诗所表现遂由言情求逸的个性意识趋向言志求功的群体意识。初唐诗人扩充“情”的涵义为伦理之情、功业之志，情志一体不分，孔颖达的“情志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之说便是基于这种心理实际。诗中表现的群体伦理、功业情志比比皆是。如骆宾王《叙寄员半千》：“薄宦三河道，自负十余年。不应惊若厉，祇为直如弦。坐历山川险，吁嗟陵谷迁。长吟空抱膝，短翮讵冲天”。韦承庆《直中书省》：“白发随年改，丹心为主披。命将时共泰，言与行俱危。”忠君守职，信誓旦旦，政治伦理深渗进诗人的情感中，已全然不见六朝诗人审美自律的影子。情有喜忧二极，而时人的喜忧都关切游宦的成功与否。穷窘者如卢照邻《山行寄刘、李二参军》：“万里烟尘客，三春桃李时。事去纷无限，愁来不自持。狂歌欲叹凤，失路反占龟。草拟人行缓，花繁鸟度迟。彼美参卿事，留连求友诗。安知倦游子，两鬓渐如丝。”其中，暮春景色引动老大无成的迟暮感，对比为官之友，深觉相形见绌。一个“倦”字，写尽苦于物役又执着追求的复杂心态。通达者则多发出“清切丝桐会，纵横文雅飞。恩深答效浅，

留醉奉宸晖”（苏环《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晖字》）一类志得意满、歌舞升平之辞。同写游宦别友的题材，且出自一人之手，在王勃诗中就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和“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重别薛华》）“自然堪下泪，谁忍望征尘”（《别人四首》其一）那样的不同诗句。前者作于“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旧唐书·王勃传》），在长安任朝散郎和沛王府修撰时，后者作于为文讽砭诸王斗鸡，被赶出王府后，有少年得志和命途多蹇的不同，诗所表现的心境自然不同。类似例子在初唐诗人中不胜枚举。情感紧系伦理政治虽非初唐诗人所独有，却是他们集中显著的特点。与中晚唐不同的是，应合国运的初升，他们对前途都比较自信，对入仕持乐观态度。杨炯所谓“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骢马》）与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行路难》）的情思比较起来，庶几全无行路难的精神准备了。这完全是出于对新建帝国的信赖感。阎朝隐《鹦鹉猫儿篇序》云：“圣上方以礼乐文章为功业，朝野欢娱。强梁充斥之辈，愿为臣妾，稽颡阙下者日万计，寻而天下一统。实以为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证。”这一有代表性的言辞，可谓时人信赖、托身朝政这种情感伦理化的注脚。

魏晋玄言诗表现了感性、直觉对哲理的探索，摹写精致的山水诗是厌倦政治后的蹊径。二者都旨在返归自然，是对伦理因袭的反叛。相反，初唐诗人的伦理化情感，常被导向自然经济的和乐安宁的温床，景物与情感融溶，渗透着伦理色彩。他们爱写春：

筵中无中秩，归耕有外臣。人歌小岁酒，花舞

大阳春。草色遍三径，风光动四邻。愿得长如此，
年年物候新。

——卢照邻《元日述怀》

独有宜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
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
归思欲沾巾。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天晴上初日，春水送孤舟。山远疑无树，潮平
似不流。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羁伤望千里，
长歌逢四愁。

——韦承庆《凌朝浮江旅思》

其中有“江春入旧年”的充满时代色彩的惊喜和展望，也有青春易逝、时不我待的羁愁。这里，伦理情感已融入春光物态，毫无主观痕迹，但从意象选择上仍不难品出。同类情调的春的意象在初唐诗中高频出现，不是偶然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为人熟知的与明月相得益彰的江岸春景，就典型地表现了类似的对生活的思考、憧憬和对时代之春的感悟。这种伦理化的情感是初唐所独有的。不但“春”成为伦理化情感的对象，初唐诗中景物描写大率如此。本来王权至上，何况“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征《奉和正日临朝应诏》）的新者？由此伦理框架出发，诗中诸景大都被写成发生化育、万象更新的景象。写雨则“皇泽乃先天”，于是“稼穡良所重，方复悦丰年”；写水则“泛查分写汉，仪星别构天”；微至尘灰也“别有知音调，闻歌应自飞”，不一而足。诸景物又被诗人们约定俗成地当作倾心于新朝的移情处。咏物诗中类似的比物拟义，注之以伦理化的情感，继《诗经》时代

孔子诗教说提倡后，六朝曾因诗人的逆反心理冷落了一阵子，至此又逐渐风靡于诗坛。以“树”为例，孔绍安由隋入唐，授秘书监，《侍宴咏石榴》诗“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为时人称道。无独有偶，张文琮《和杨舍人咏中书省花树》：“影照凤池水，香飘鸡树风。岂不爱攀折，希君怀袖中。”皆以庭树自况，诉葵藿之性。常用意象更是如此。如“蝉”，在通达者笔下是“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在蹇蹶者笔下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在狱咏蝉》）。无论穷通，都要高响有为，饱含初唐人的希望色彩，与晚唐李商隐“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那种近乎绝望的痛苦绝然不同。又如“雁”，初唐诗人写作“为有传书意，联翩入上林”，“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也异于晚唐人孤影自怜的拟义。刘洎《安德山池宴集》所言的“已均朝野政，还欣物我齐”是对初唐诗人伦理化情感与自然融溶的最好写照。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对艺术认识方式的阐释那样：“直观中的个别事物已上升为其族类的理念。”初唐诗中的意象极多是新兴阶层伦理化情感的对象化。以其新兴，情感的美学风貌在和谐多致的传统基础上，又多了一片欣悦达观、憧憬探求的时代特色，可谓唐音伊始。

初唐士人这种情感的伦理化，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适应了初建王朝维系统治的需要，但同时又是可悲的。其可悲处在于随着伦理框架在士人心中的渐趋牢固，把朝政的历时性当作共时性，把参政做官视为唯一的创造出路。于是，溶合了个人情感的伦理框架遂成为士人创造力的桎梏。